

关于部分损毁古建筑（古园林） 复建的思考

张建文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文物古迹众多。这些珍贵的文物古迹，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學習。如何使这些文物古迹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就部分损毁的古建筑和古园林是否应该复建、应从哪些方面考量等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

首先是精神传承重要，还是物质传承重要。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而言，保护的目的在于能够完整地体现和延续物质的历史形态、特质和文化内涵，传承的目的在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保护是基础，是服务当代、传承后人的需要；传承是目的，是展示和研究历史脉络、文化精髓，弘扬民族精神，振奋民族士气的手段。因而，应科学全面地看待和认识保护遗产的物质形态与传承文化精神的关系，从传承文化和精神的角度，去思考如何保护遗产资源的物质形态。

我国的古建筑和古园林是见证历史的重要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记载历史事件，展示历史信息，保护和传承这些重要的遗产资源，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文化以及辉煌的社会成就，能够激励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但是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比如年代久远，风雨侵蚀，自然灾害，国力衰弱，外敌入侵，以及在保护管理上的不到位、不尽职等等原因，造成众多古建筑、古园林的损毁和破坏，承载和延续民族历史、文化、科技信息的一些重要载体残缺甚至完全消失，致使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财富遭受重大损失。

那些承载重要历史信息的古建筑、古园林的损毁，无疑使我们在研究历史文化、历史科技的过程中，缺少了最重要的实物佐证，子孙后代更是只能从文献资料中来窥见当初的史实。从另一方面上讲，每一座古建筑、古园林的诞生，都能从某一方面体现当时社会的辉煌成就，挫折的历史不应掩盖最初的辉煌。特别是从文化和精神的层面上讲，当代人也好，后世子孙也罢，都希望在不忘历史挫折的前提下，能够深切感受到民族祖先创造的伟大。历史悲剧所起到的警示作用，与民族祖先带给我们的骄傲都一样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某些时候，伟大气魄的激励与负面因素的警示相比，前者更能起到鼓舞士气的效果。

因此，对于一些部分损毁的古建筑、古园林进行复建，有助于历史信息的完整传承，有助于更直观地解读历史，感受民族的历史荣辱。比如说：对于那些在战争年代毁坏的古建筑、古园林进行复建，并做出相应的标识，既可以再现这些古建筑、古园林历史上的精湛技艺和灿烂文化，使其完整地传承于后人，也可以更直观地警示后人，历史的挫折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如此之巨大。

二是记录历史的瞬间重要还是记录历史全过程重要。历史反映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会局限、凝固在某一个时间和事件的节点。遗址是古建筑或古园林遭到损毁后的残存形态,记载的是该古建筑或古园林建成后某一历史时刻或历史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遗址不能真实全面的反映该座古建筑或古园林最初的建造水平、建造工艺、文化特色,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孕育出的相关文化艺术,体现不了古建筑和古园林本身的全部历史过程和文化内涵。而古建筑、古园林本身所反映的建造时期的相关历史,以及其建成后对于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繁荣的价值,都得到完整的记载和传承,才能服务于当代和后世的发展,才能使先人创造的智慧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利用。这既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规律。从这一角度上讲,对于部分损毁的古建筑、古园林进行合理的复建,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负责,对历史完整性的负责,对传承文化和精神的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的负责。湖南岳阳楼,历史上曾多次被毁,而后复建,其中最早一次是在北宋元丰元年(1078)十月毁于火灾,元丰二年,岳州代理知州郑民瞻重修岳阳楼,之后,岳阳楼十数次被毁,也都得到及时复建,才使得这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名楼屹立至今,并因此孕育了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史话,使之成为了著名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建成后曾屡遭焚毁,多次重建,如果没有进行复建,今天的故宫也许就不会如此厚重,也就不会有这般恢宏气势了,故宫也就不能称其为故宫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古建筑、古园林的保护工作,特别从提升民族工作的角度重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工作。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就此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最大可能恢复作为民族团结丰碑——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历史风貌。从1976年开始,承德市先后实施了三个《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十年整修规划》,并对山庄内外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拆迁和环境整治。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避暑山庄内的康乾72景从建国时的7景已恢复到现如今的56景,周围寺庙中的6座寺庙也都基本再现了康乾时期的历史风貌。

系列整修规划的实施,一方面,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历史盛况得以重现,使承德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国际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另一方面,广大游客穿越时空,直观地感受到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繁荣历史;也深刻体会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巨大成就,体会到了党和政府在推进民族团结,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付出的努力。

三是复建是不是文物保护。如前所述,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保护的目的在于能够完整地体现和延续物质的历史形态、特质和文化内涵,传承的目的在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复建古建筑、古园林,在尊重历史,遵循相关原则和标准的前提下实施,除了不具备文物原有的物质特质外,其余的文化属性和形态都将得到继承和展示。将古建筑群、古典园林里的遗址进行复建,可以最大限度地恢复当时的建筑风格和风貌意境,能更有效地全面展示当时的建园理念和历史环境,特别是当时的文化理念,能让人们更直接地感受到历史的文化氛围,其文化价值才能被普通民众所了解。

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专家马炳坚先生曾经说过,“文物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本身的存在,只有存在它才是‘历史的见证’,‘世界的年鉴’。我们平时所说的文物的三大价值,都是要通过文物本身来体现,如果文物不存在了,一切价值也就都没有了”。复建的古建筑、古园林虽然不是文物,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该古建筑、古园林原有历史信息和社会功能的承载和传递功能。因此,无论从保护传承的目的上讲,还是从复建本身在保护与传承中所起到的角色作用上讲,复建措施都应是利于古建筑、古园林整体价值体现和传承的有效的、必要的补充方式。

当前,部分遗址采取搭设保护棚的方式进行保护,但搭设保护棚不能将文物内在的、深邃的、精

神层面的东西直观的展示给世人，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那里曾经有一座古建筑，现在用一个棚子将其遗址遮住保护起来。这种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同时也对古建筑、古园林的整体景观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遗址归安也是一种常见的遗址保护办法，但由于目前的技术条件等多方面原因，归安后的遗址极易产生风化现象，无论从保护效果还是持续时间上，往往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实施复建则大大减少了此类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曾对承德避暑山庄珠源寺、清音阁、清舒山馆等遗址进行过归安加固保护，但由于无法有效解决遗址排水和冻融问题，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台阶条石、柱顶石、墁地砖等遗址重要组成部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风化，造成了一定的损坏。但与这些实施了归安保护的遗址同期复建的卷阿胜境、金山、法林寺等古建筑，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此外，对损毁的古建筑、古园林进行复建也有利于传统工艺的传承。我国古建园林营造技艺博大精深，如损毁的古建筑、古园林长期不进行复建，那么其遗留的历史信息会越来越弱，古建筑设计人员及工匠也将失去学习研究传统工艺和实际操作的机会，长此下去将会造成传统工艺的失传。

四是复建要遵从不改变历史原状的原则。损毁的古建筑、古园林的复建工作首先要遵从不改变历史原状的原则。不改变历史原状包括其选址、外在形态以及内在的历史信息。这是实施和做好古建筑、古园林复建工作最重要的前提。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凝聚着先人广博智慧的古建筑、古园林，特别是对那些蕴涵着丰富治世理念，有着深远的教育和启迪价值的，或是那些能够完美地展现中华民族在建筑、园林、文学、艺术等方面伟大成就的古建筑和古园林精粹，不改变历史原状，绝不是对原有建筑或园林历史形态简单地重现，而应作为一项系统的，历史、政治、建筑、生态、环境、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等等方面的研究、探索、挖掘、展示工程；一项多学科、多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教育工程；一项有着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增进团结等多重功用的，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工程来研究、对待和推进实施。恢复的是景观，展示的是文化，昂扬的是一个民族经久不衰、永不言败的斗志和精神。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认识、理解、研究、实施古建筑、古园林的复建工程，自然就能够摆脱把复建仅仅当作增加景观，开发旅游项目，把遗产资源简单当作地方发展经济工具的现象。自然就能够确保复建的古建筑、古园林所承载和传递历史信息的精准无误。

实施古建筑、古园林复建工程，必须坚持“原址、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和“修旧如旧”的原则，这是确保复建项目不改变历史原状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也是行业管理部门对复建工作提出的必须遵循的明确要求。落实这一原则，必须做到把好四个关口，强化四项管理。把好四个关口，一是把好设计关，要选择具有文博单位修缮设计高级别专业资质，相关项目设计经验丰富，行业内具有良好品牌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复建项目安排的初衷和确保项目的高质量。二是把好专家论证关，每一个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论证，要广泛征求历史的、古建的、园林的等等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意见，不断完善设计方案，通过专家把关来确保设计方案合理。三是把好施工队伍选择关，选择施工队伍，既要审查资质，也要审查素质；既要审查业绩，也要审查品牌。要坚决把那些虽有资质，但队伍素质不高，或根本就是借用资质的排除在外。要深知，再好的食材没有好的厨师也做不出可口的美味佳肴。四是把好原材料关，古建筑、古园林的复建对于材料的使用极为严格，必须从材料的产地、品种、品牌、质地、环保标准、进货渠道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定和管控，坚决杜绝以次充好或偷工减料的现象。强化四项管理，一是强化施工过程的管理，现代管理学观点认为：过程的管理决定着质量和效果。古建筑的施工更是有着复杂的工艺和流程，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艺出现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古建筑的安全、质量和寿命。二是强化质量标准管理，对于

现代工民建筑的质量标准，国家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古建筑和古园林的施工，国家有关部门虽然有行业指导标准，但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标准的高度，且在有些方面还不够详细和明确，因此，对于每一项古建筑、古园林复建工程，都应就质量标准管理制定详细方案、提出详细要求。三是强化建设时间管理，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的复建工程，在时间安排上必须进行科学的评估。目前，从很多的工程案例来看，相当一部分工程项目存在工期管理的问题。古建筑、古园林复建工程建设的时间安排，必须严格依据材料特点和工艺流程进行核定，不能原则性地要求时间服从质量，更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进度。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和验收管理，要严格实行监理制度、专家旁站制度，强化工程施工过程的监督；严格实行材料质量检验、环保参数检验、阶段性的质量抽查和整体工程竣工验收的相关制度，确保工程使用的每一类原材料都符合质量标准要求，每一个施工环节都符合质量管理规定，真正打造古建筑、古园林复建项目的精品工程。

综上所述，对部分损毁古建筑、古园林进行复建，既是传承古建筑、古园林物质形态的需要，更是传承其文化精神的需要，是传承的要求，更是保护的手段。应积极地认识复建工作对于古建筑、古园林本身和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传承的重作用，因地制宜、科学妥当地决策、安排、实施、管理好古建筑和古园林复建工作。

（张建文：承德市文物局）

避暑山庄文化底蕴

孙继新

承德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典型的离宫别苑之一，它集中国古代三千年造园艺术之大成，巧妙地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以大写意的造园手法揭示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移天缩地在君怀”的传统帝王哲学，充分表现了华夏匠人在园林建筑中“源于自然、顺应自然、超越自然”这一朴素的艺术指导思想。是我们了解先人历史，研究山庄文化最直观、最可靠的实物例证。

研究山庄文化，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避暑山庄文化”。笔者认为，避暑山庄文化严格地讲，应该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它是建立在避暑山庄、外八庙这一文化载体之上，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以游牧民族文化为补充，又以“王气”加以贯通而产生的一种文化。避暑山庄也正是以这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而蜚声中外。因此，笔者将就四个方面做一简单论述。

一、山庄文化以地域文化为基础

承德，旧称热河，地处燕山腹地，属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区域，滦河及其诸多支流潴泓徜徉。其间气候清爽、水沃泉甘，草原牧族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犬牙交错，日月恒升。先天的自然基因，使得这一区域的文化，从一产生就带有明显的双重性，草原的粗犷豪放与中原的纤巧细腻、水乳交融、相映成趣。湖河岭川养育了勤劳智慧的先民，孕育了古老、悠久的历史。如围场下伙房出土的玉环、玉猪代表着红山文化的最高艺术成就，而大量彩绘陶器的出土又明显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丰宁发现的“亚牧”族徽符号，青龙出土的鹿首弯刀，以及战国铁范、秦代铁权，汉代冶铜遗址等等大批的历史文物，无一不预示这一区域文化的双重性。特别是平泉黄窝山石棺墓的发掘，具有典型中原特点的铜戈与鲜明山戎特色的短剑、削刀同出一墓，足可以证明两种文化的融合与贯通。

然而，历史上的承德，并不是祥和、太平的多民族聚集地。在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的同时，往来不息的征战绵绵不息。拓宇开疆的扩张、弱肉强食的吞并、侵夺资财的劫掠、民族之间的征伐，在狼烟四起，兵戈相见的同时，生灵遭到涂炭，文明的进程也受到一次次毁灭性的湮灭。因此这里的地域性文化始终得不到长足的发展，而是处于一种游移、落后的原始文化态势。

清朝初年，随着中原形势的日趋稳定，北方大漠那个被清统治者视为可靠同盟军的民族却呈现出焦躁不羁的势头，就在康熙皇帝治政伊始，发生了漠南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兄弟的叛乱。这次规模不大

的叛乱却给康熙帝以很大的震动，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君明主以其超人的胆识，非凡的气魄将睿智果敢的目光迅速从大江以南转向西北苍苍茫茫的草原，转向那个骁勇骑射著称的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

蒙古族生活在大漠深处，素称彪悍，“三皇不治、五帝不服”。蒙古骑兵来如闪电，去似风尘，出入龙沙，影踪不定。清军创业之初也正是借助了蒙古铁骑的力量，才得以挥师入关，中原逐鹿。因此康熙皇帝一直视蒙古诸部为自己坚实的后方，可靠的同盟军。但如何巩固这种关系，“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①，已成为摆在统治阶级面前的首要问题。康熙帝在认真总结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后，一改前朝“筑长城、设重防”的被动防御方针，做出了“怀之以德、慑之以兵”^②，“因其教、不易其俗”^③和“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④的民族怀柔政策，利用精神上的感召祈望心理上的认同。然而蒙古“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蔽塞外，恭顺有加，每岁入朝，锡赉燕飧，厥有常典。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惧，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⑤可见，为巩固满蒙联盟加强北部边防实现康熙帝“怀柔、徕远”的民族政策，必须寻找一处往来便捷、林秀风清之所在作为皇帝大会蒙古群藩之用，来解决蒙古诸部首领以进京为惧的身体上乃至心理上的重重障碍。

康熙皇帝在经过数次北巡，亲自择址相地之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这个“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⑥的小村落——热河上营，下令破土动工、肇建行宫。作为自己涤烦去暑和大会蒙古群藩之所。

康熙帝之所以择址热河，归纳为几个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首先是气候，热河一带属燕山余脉，海拔300—700米之间，塞罕坝和七老图山宛若“∩”形屏障，削弱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又将顺滦河流域上溯的海洋性温湿暖流阻挡于坝下，因此这里气候温润、清凉爽垲，康熙帝称颂这里“境广草肥，无伤田庐之害；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汇”^⑦。的确是帝王们避痘消暑的良好所在。其次是便利的交通，热河虽处长城塞外，然距长城古北口不过二百余里，交通便利，往来及时。又去京师至近，“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地辟荒野，存心岂误万几”^⑧。再次热河又是京师通往蒙古众部及东北的咽喉要道；是“北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⑨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八旗劲旅狩猎强兵“拱卫神京”的塞外大本营。当时康熙去主持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就是经这条通道北上的；清廷使团与沙俄谈判划分中俄边界是经过这条通道抵达尼布楚城的；俄国使团也是经由这条通道抵达北京的；十万清军大败厄鲁特蒙古领主噶尔丹走的是这条通道；康熙亲自率军歼灭噶尔丹主力向漠北克鲁伦河推进也是走的这条通道。木兰围场建立以后，这条通道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于是康熙帝为了实现其“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需要，将避暑山庄建在了宫阙灿灿、仪典皇皇的京都与长天苍苍、大野茫茫的木兰围场之间。加之这里群峰环绕，清流潺潺，蔚然深秀，兼具南秀北雄之美，避暑山庄便逐渐发展成康乾二帝治理边疆，完成统一大业的又一政治中心。

（二）木兰围场的设立

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清朝皇帝要以人口很少的满族来驾驭文化发达、人数众多的汉族，统治历史上武功煊赫、分布地域辽阔的蒙古族，清朝皇帝必须具备经文纬武的两套本领，八旗军必须发扬“以弧矢威天下”的尚武传统。康熙帝时时刻刻铭记清朝“下马则亡”的祖训，为了训练满洲、蒙古、

汉军八旗强化武备，同时也是为了加强与北部民族的联系，他于康熙二十年（1681）在原属蒙古喀喇沁部和翁牛特部的地域内设置木兰围场（“木兰”是满语，汉语是“哨鹿”的意思。）每年都要率领八旗军赴围场举行“习武绥远”的秋狝大典。陪同随围扈从的蒙古贵族们既被玄烨骑射俱精的“天威”所慑服，又被清政府丰厚的赏赐所激励，他们心悦诚服地簇拥在玄烨周围，“戴之如天，亲之如父，奔走效顺，融洽无间”^⑩。在秋狝大典期间玄烨还经常出巡蒙古地区，途中往往到下嫁蒙古诸部的公主家中欢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

那么从京师到木兰围场沿途修建了二十一座行宫，处在中间枢纽的就是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就是在热河行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为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不必长途进京提供了与清廷彼此交谊的机会和场所，同时清帝为巩固统治，在这里修建了普宁寺、普乐寺、须弥福寿之庙等十几处寺庙，在边防上起到了“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作用。

在乾隆时期访问过避暑山庄的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把对山庄的感受写进了《热河日记》中，他说：“热河乃长城外荒僻之地，天子何苦而居此塞外荒僻之地乎？名为避暑，而实为天子自备边也。”他的学生柳得恭在《滦阳录》中也对此表达了感叹：“窃观热河形势，北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山庄’者，特讳之也。”这两位朝鲜学者的感受，可谓摸到康熙的脉搏。

由是可知，康熙帝择址热河，肇建行宫，亦是经过慎密的思虑以后决断的。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皇帝正式为行宫赐名“避暑山庄”。从此热河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细腻的农耕文化与粗狂的游牧文化迅速在这里际会郁结，皇帝巡幸又促使中原人力、财力的大量涌入，经济的繁荣同样也带动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先进的文化、精巧的工艺随之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使封闭落后的小村落一跃成为“生理农商事，聚民至万家”的大集镇了。可见避暑山庄的肇建和使用，无疑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地域性文化从此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和飞跃的前进。

随着乾隆皇帝对避暑山庄大规模扩建充实，这里已初步具有都市的规模和气势。乾隆帝亦曾感慨：“皇帝诗云‘聚民至万家’，今则不止于万，俨成大邑矣。”“热河自皇祖建山庄以来，迄今六十余年，户口日滋、耕桑益辟，俨然一大都会。”

二、山庄文化以“以儒治国，以教治心”， 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治国方略为主旨

（一）康熙帝确立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治事哲学

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就强调：“帝王敷治，文教在先。”把实行“文治教化”放在统治的第一位。“文治”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传统。它的主要内容原本是“任用儒士”，注重儒家思想的宣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加强社会各个方面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设，来化民成俗。它不仅强调指导思想，也强调多方面的文化建设本身，在此基础上实现一种“长治久安”。

时至康熙时代，这种“文治”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包括大搞文化工程建设，大量修书，重视学校，甚至迅速认同汉族先进文化，开博学鸿词科等内容。这对清代的文化发展起到过显著的积极作用。

康熙帝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雄才大略、智勇兼备的封建君主。康熙帝非常注意本身各方面才能的增长和对汉族经史子集的学习，他一生讲求儒术，对程朱理学尤为推崇，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全体臣民面前树立了一个“儒学天子”的形象，在汉族讲官的辅导下，他孜孜向学，稳步实施“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以其在汉文化的修养、统治的经验策略方面高于汉族地主阶级，从而赢得广大汉族士大夫和人民的真心拥戴。康熙如此刻苦地学习儒家经典，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

清帝入主中原后，根据国情采取了利用喇嘛教团结边疆蒙藏民族，对中原汉族居住广大地区实施“以儒治国，以教治心”，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这一政策在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仁怀天下，宇内一统”的儒家思想在山庄文化中的体现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从建造前的构思就决定它绝不是单纯的园林与寺庙。它们是清朝帝王为加强边疆地区的管理、团结少数民族、巩固北部边防而修建的夏宫和皇家寺庙群，具有鲜明的政治背景和特殊的政治功用。在造园和建筑上，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综合运用了多种传统技艺，荟萃全国各地名园胜景，博采满、汉、蒙古、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巧妙地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避暑山庄、外八庙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与寺庙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和总结。

1. 山庄的整体布局以“大一统”为指导思想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华民族的情结。经过数千年的蕴蓄积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进取，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终于实现了稳定的国家大一统局面，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堪称超越千古。

避暑山庄的整体布局 避暑山庄是中国帝王宫殿与皇家苑囿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古代宫殿和园林建造几乎与中国古代文明史同步，二者经历了由分设到结合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到避暑山庄的建造二者才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避暑山庄的总体布局是前宫后苑，在置景上采取象征与集萃的手法，把儒家思想融入造园之中，使之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从避暑山庄的布局大势上，它以其东南湖区、西北山区、中部平原区及东低西高的走势，模拟了中国地形的大势，而围绕着山庄蜿蜒 10 公里的城墙仿佛中国的雄伟长城，使整个山庄酷似中国广袤河山的微缩模型。在景物选取上，采取多种方式，将全国各地名胜荟萃于山庄之中，如有仿自江南胜景的文津阁、金山上帝阁、烟雨楼、文园狮子林、沧浪屿、芝径云堤等，也有仿自蒙古草原的蒙古包群，还有仿自山东的广元宫等等。使 564 万平方米的宫苑，扩大成为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微缩景观，收到了“移天缩地在君怀”和“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观”的效果。因此山庄建造的整体布局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帝王哲学的物态载体。

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关系 从康熙帝在承德修建的第一座庙宇溥仁寺开始，康乾两帝历经六十多年的时间在山庄周围共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广缘寺、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 12 座喇嘛庙，这十二座庙宇有的仿自北京，有的仿自山西五台山，有的仿自新疆，有的仿自西藏。不仅建筑宏伟壮观，绘画、雕塑技艺高超，而且几乎都蕴含着一段历史或民族团结史。外八庙从属于山庄并服务于山庄，两者在建筑格调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避暑山庄朴野淡雅，虽然是皇帝的夏宫，却一片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大有北方民居的风格。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体量巨大、规模宏伟的周围寺庙，它们大多是使用鎏金铜瓦或琉璃瓦覆顶，一眼望去，一片金碧辉煌。在这鲜明的对比中，使你感到不是皇家的简陋，而是其蕴含的深刻。在建筑形式上，避暑山庄的建筑则采取以汉式为主体的建筑方式，以显示清朝入主中原吸收汉文化的实力与气魄；山庄外的寺庙则采取汉式、藏式、汉藏结合三种不同的建筑方式，以显示其兼容并蓄、借鉴融通与遐迩一体的政治手段与愿望。外八庙以山庄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体现了“五服”俱向，“仁怀天下，宇内一统”的治世思想。

2. 山庄内碑匾联对被赋予了浓厚的儒学意味

避暑山庄564万平方米，由康乾两帝题写的碑匾联对比皆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很多主观意识，则通过题匾、撰联、题诗等方式进行了揭示与暗示。

山庄的正门丽正门 此匾额由乾隆帝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题写。“丽正”源出于《易经》。《易·离卦》里说：“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意思是说：日月依附在天，百谷草木依附在于土地，皇帝要像日月一样合乎自然规律依附正道，才能教化万民和统治天下。而用五种文字题写则体现了清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山庄正宫区主殿“澹泊敬诚”殿 这块匾由康熙题写。澹泊一词源于《易经·系词》：“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是居安思危，崇尚节俭的意思。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戒子书》中用“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来告诫后人，康熙对此极为欣赏，并借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同时告诫后人生活上要简朴，政治上要有远大目标。

“四知书屋”：正宫区的另一座建筑。是清帝接见近臣的小朝之地。“四知”同样也源于《易经》中的“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里提到的“四知”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统治政策，从而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

勤政殿：乾隆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第二景。为乾隆兴盛时期修建的东宫中主要殿堂，是皇帝处理朝政的便殿。

勤政，是皇帝自勉之意，对政事要尽心尽力，不稍厌怠。正如乾隆在勤政殿一诗前言中所说：“这里是我在山庄日常办公之处，我之所以题名勤政，是遵守祖宗的传统章法，要不知疲倦地勤劳政事，不能稍有懈怠。”殿内面南有匾题“正大光明”；面北有匾，题“高明博厚”。乾隆诗曰：“漫施藻棁长阶莎，具足云山四面罗。不息自强励勤政，永钦家法咏卷阿。”诗的前两句意思是，殿堂的梁柱只是随意地彩绘，殿前台阶两旁长满了莎草，烟云笼罩的群山罗列环绕。诗的后两句意思是，我要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勉励自己勤于政务；永远敬仰遵循皇祖、皇考的家法，举贤任能，治理好国家。

“戒得堂” 是山庄苑景区的一组建筑。“戒得堂”由乾隆题写。“戒得”二字取自于孔子的《论语》，即“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壮期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里所说的“戒之在得”，是指人到老年之后，由于身体衰弱，开始考虑后事，容易变得贪得无厌，企图拥有世上的一切。因而戒之，此则为君子修身之戒。

“抑斋”匾：烟波致爽西暖阁门斗上方，面东悬挂着乾隆帝“抑斋”匾。匾为绢地墨书，楷体，镶蓝色绫子边。匾上方正中钐“乾隆御笔”阳文篆字玺印。“抑”指克制。《尚书·无逸》：“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斋：书屋，房舍。唐代韦应物在《八郡中西斋诗》有“似与尘境绝，萧条斋舍秋”。抑斋，直接取《诗经·大雅·抑》篇名作斋名。

在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清代皇家宫苑帝后寝宫中都有此匾。乾隆帝题“抑斋”，是提醒自己并后世子孙借鉴历史教训，不可只知享乐的思想。乾隆帝还在《御制抑斋记》中阐述了《诗经·大

雅·抑》篇的内容,告诫自己和后世子孙,要保持大清江山永固,应牢记历史上的古训,书抑斋匾悬挂,以为座右铭,日诵于侧以自警。

“绿毯八韵碑之平旦”此碑坐落在山庄澄湖北岸,万树园的南端。碑身面南镌刻七言诗《绿毯八韵》一首,面北镌刻五言诗《平旦》一首。两首诗字迹清晰,结构严谨,风格秀丽。

《平旦》原文:“孟子言平旦,惟戒人桔亡。岂知曲阿明,所被遍圆方。粤宛鼓太和,清明含百昌。夜气于旦见,匪谓阴胜阳。我每因宵衣,逢斯于山庄。金乌扶桑枝,苍苍复凉凉。露光湛浅芜,其芳袭人香。林禽与原兽,各自适其常。何所容好恶,人物胥同良。出王及游衍,亦怀抑戒章。”这首诗是弘历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写成的。平旦,犹平明,即天亮的时候,孟子在《孟子·告子上》里曾借助“牛山之木”作比喻,宣扬人要保持所固有的“良心(仁义之心)”,要防备到了平旦因与外界事物接触而丧失掉。弘历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平旦》这首诗里,他极力赞美避暑山庄充满光明、富有生气的平旦。弘历赞美山庄的平旦,在于用繁荣昌盛的景象比喻当时的朝政,歌颂其为“清明盛世”。他自己是朝廷的主宰者,所以,他赞美山庄的平旦,歌颂当时的朝政,也是歌颂他自己。

另外还有奉三无私、水流云在、有真意轩等几十处,字里行间中将康乾两帝的心路与治世哲学得以表露。

3. 佛家文化在山庄中的体现

由于避暑山庄特殊的政治军事需要,时代的主旋律在造园布局构景上表现得更加集中鲜明。首先是在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的前提下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强调。出于政治的需要,清帝尊儒学为正统,同时又包容了其他宗教,形成了儒释道三教相融并存的态势。因而避暑山庄在儒家正统文化的主导下确立了建筑整体主基调的同时,在山庄外围建造了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外八庙,集中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意旨和当时的一种政治趋势。实际上乾隆中叶的宗教政策正是利用藏传佛教首领的传统势力和政治影响,牵制蒙藏世俗势力,控制王公贵族,化导、柔顺蒙藏民族。清朝统治者在总结了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后,制定了“因政设教”的民族政策。而乾隆皇帝本人是以一种大度、超脱的圣人气度对藏传佛教予以宏扬和护持。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曾经预言:“东方主尊是文殊,有时出比丘像,有时现国王像。”中国位居世界的东方,因此西藏达赖喇嘛在给乾隆帝进献的丹书中,称皇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乾隆帝索性笑而纳之,并在承德建了一座“殊像寺”供奉文殊,寺中所有喇嘛皆为满族,乾隆帝还亲自抄写了《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四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四部存于该寺。因而此庙又有乾隆家庙之称。表面上乾隆帝醉心于佛经梵呗,又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文殊菩萨的转世,但实际上他对于佛神不过是付之一笑。“香界从来知佛大,而今更识帝王尊。”“殊像亦非殊,堂堂如是乎。……丹书过情颂,笑岂是真吾。”^[1]对于别人称颂皇帝为文殊转世,弘历倒也的确乐于接受。

外八庙中的普佑寺是皇家的经学院,每年有大批喇嘛在此研修;殊像寺供奉的是乾隆皇帝的前世文殊菩萨,是君权神授的最好佐证;须弥福寿之庙是为六世班禅专程由西藏来热河祝贺乾隆七十寿辰所建。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安远庙、普乐寺,这些寺庙无一不是民族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这些宗教寺庙不仅传达着我国古代的宗教思想文化,而且闪烁着康乾时期的民族宗教思想的光辉。这就是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在。

另外在山庄内清帝也建造了众多的庙宇如珠源寺、永佑寺、碧峰寺、鹫云寺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帝正宫的后寝部分就设有三个佛堂——十九间房宝筏喻、烟波致爽寝宫佛堂、云山胜地楼莲花室。当时,乾隆帝曾经手挽手同六世班禅一起登临云山胜地楼,到莲花室礼佛。从而达到了“敬一

人而万人悦”的政治目的。

4. 道家文化在山庄的体现

避暑山庄中建有许多道观。如金山上帝阁、斗姥阁等。其中，斗姥阁里面供奉的斗姥传说是玉皇大帝、北斗众星之母。而我国古代常把天子喻为北斗，众星拱之，表达了皇权至尊无上，天下归附之意。佛教寺庙涌翠岩供奉了关公。他不仅是儒家忠义思想的化身，佛教护法“伽蓝”神将，还是道教“至道真君”，显示了不同宗教殊途同归，共同为皇家服务的特征。

康熙、乾隆在对避暑山庄景物数量的命名也是采取附会道教神话的方法，来表达“居心思道”的思想。如七十二景，山庄内佳景甚多，而为什么只列了七十二景。首先是康熙帝列了三十六景，玄烨受道家影响所致，道家认为仙人所居之处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所以弘历在乾隆十九年步玄烨之后，又以三字为题名的景物组成了“乾隆三十六景”，凑成了七十二福地之数。弘历有诗为证：“已是洞天传玉简，得教福地续琅书。”就体现了道家思想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寓意。

在建筑手法上使用了“一池三山”传统的造园手法。避暑山庄中的环碧岛为山庄“一池三山”格局的三仙山之一，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四十七年（1708）。正殿康熙题额“环碧”，偏殿为澄光室；门殿西券门额镌刻“蓂芳”、“拥翠”为御笔所书。岛北濒湖草亭一座，康熙四十二年建，题额“采菱渡”，为乾隆三十六景之第十三景，是皇帝和后妃荡舟采菱游乐时休息之地。每年七月十五中元节，皇帝在岛上举行“盂兰盆会”，燃彩灯、彩船、做法事活动。

三、山庄文化与帝王之气相融会

（一）建园的指导思想

康熙于1711年所写的《御制避暑山庄记》中阐明了他当时建山庄的造园宗旨。他在诗中写到“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只需“依松为斋”就能“窍崖润色”，只需“引水在亭”，就能“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借芳甸而有助，无刻桷丹楹之费，喜泉林抱素之怀”。这就是康熙皇帝建山庄的基本思想。他主张“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草木勿动树勿发”。他所希望的这座园林来源于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超越自然，回避人工的雕饰，师法自然，成为“朴素之美，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典型艺术之作”，从而达到“静观万物俯察庶类，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阳而成群；鸢飞鱼跃，从天性之高下；远色紫氛，开韶景之低昂”的空间效果。从而使“天人合一”的造园思想得以体现。在正宫中一些台阶改成了如意踏步。云山胜地楼的蹬道，没有用规制的台阶砌成，而是用假山落叠而形成一种自然的意境。

（二）帝王之气的自然流露

1. 规整的建制

正宫区的建制严格依照皇帝“九五至尊”的规制。我国古代把阿拉伯数字分为两组1、3、5、7、9为阳数，2、4、6、8为阴数，皇帝占阳数最高位和最中正的九与五，因此《易经》乾卦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思是九五之阳使皇帝这条龙升腾高空，俯瞰大地，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庄重的陈设

宫廷陈设是国家政策的反映、皇帝思想的体现。清代的统治者为使皇图永固、国祚绵长，在宫廷陈设中大量使用了吉祥图案。吉祥图案至清代已经历了漫漫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较之秦汉，不仅其外形日趋规整庄重，其内含也更为丰富和深化了。殿内装饰、堂中玩物、雕刻绘画、造瓷制铜、摆桌设案、挂匾贴对，都严格遵循帝王们吉祥如意的主旨意愿。这也使紫宸大内的陈设日渐规整化、公式化、繁复化。

避暑山庄正宫三座主要殿堂，即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和烟波致爽殿的陈设基本上代表了避暑山庄陈设的最高水平，尽管它们各有千秋，但就其陈设的总体指导思想而言，它们又是相互依存、一脉相承的，都是围绕着封建统治阶级美好意愿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我们通过避暑山庄三大殿吉祥图案的设置，就可窥视出清代帝王的心路所向。

首先体现出因政设教，广结善缘的意愿。在三大殿中，有关藏佛的内容很多。寝宫烟波致爽殿的西次间，紧靠皇帝的寝室，就是供帝后晨昏礼佛之用的佛堂。当年堂内供奉大小佛像六十余尊。像前供桌上就摆有佛教中表示吉祥的供器——七珍和八宝。这种陈设绝不单纯只是具有宗教含义，它还融入了诸多的政治因素于其中，是皇帝祈望四海归心、宇内一统的象征，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帝王为使其皇图永固而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卓越成就。

其次是对龙凤龟麟，福禄寿喜的祈望。如果说清代帝王对于神佛的祈望只是一种外在的象征，那么对健康长寿、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则是内在的、发自肺腑的祈盼。

在三大殿中，有关龙凤龟麟，福禄寿喜的吉祥图案可谓比比皆是。如“澹泊敬诚”匾上的边饰“群龙戏珠”，澹泊敬诚殿门板隔扇上雕刻的“五福捧寿”，四知书屋及烟波致爽殿皇帝御座之上，均有一栴式痰盒与一如意置放一起代表“事事如意”，另外还有太平有象、流云百福、三多九如、流传百子、松鹤延年等等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它们都是作为清代帝王追求、祈望福禄寿喜而世代相延下来的一种见证。

3. 考究的匠作

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园林，是清王朝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清人赞誉其为“宇内山林、无此奇丽，宇内园亭、无此宏阔，先后布置，皆由圣心指点而成。未成之时，人不知其绝胜，既成之后，则皆以为不可易矣”^②。可见，山庄修建之“奇丽”、“宏阔”、“绝胜”，是康熙、乾隆两代皇帝灌注政治理念，亲躬谋划，构设精湛的一座空间环境艺术品。其中有“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可谓“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其营造“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因此，在避暑山庄的营造上，清帝曾从全国调来优秀的匠役，在圣心的指点下，将中国古典园林传统营造思想与形式相结合，充分展示我国古典园林包蕴山海的造景技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亦是封建末世，在园林营造理论与实践，作出时代创新的精品缔构。

4. 重要的地位

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避暑山庄始建到咸丰十一年（1861）这158年中，清王朝的十位皇帝就有七位皇帝在此驻跸。特别是康乾时期，几乎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和接见外国使节。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功用，许多在清代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接见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接见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接见从沙俄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等、在这里曾经发生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从这里发迹等等）。因此可以说中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和外交风云，有很多是

在这里汇集的，中国十八世纪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诗篇有很多是在这里书写的。

四、清代帝后及扈从文臣在山庄的文化活动是山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避暑山庄落成之后，康乾两帝每年都要到山庄驻蹕数月。山庄内的文化活动也随之兴盛起来。如在每年的七月十五在环碧举行的盂兰盆节、七月初七在如意洲岛举办的乞巧盛会、中秋、重阳等等节日，皇帝每必有诗作。特别是乾隆帝自即位第六年起，开始巡行塞外，至乾隆六十年，共巡幸塞外49次。在避暑山庄度过48个中秋节，而在这48个中秋节里共作中秋赏月诗100余首，活动丰富多彩。

除了宫廷节令之外，清帝还经常组织那些扈从文臣在山庄内的“曲水荷香”举行“曲水流觞”的活动。大臣张廷玉曾说：“扈从塞外，蒙恩召入行宫，泛舟观荷，便览诸胜，赐宴于流杯亭。”^⑩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日，大臣汤右曾等人也曾在此陪康熙帝饮酒赋诗，他在诗中说：“波回芷岸接菱汀，曲水流杯眼乍经。总为帝书真第一，恍从兰渚到兰亭。”^⑪乾隆十九年（1754），清帝也曾在此举行小宴，招待蒙古托尔伯特亲王策凌等。另外这些扈从文臣们在参政议政之余，将自己在山庄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或自行或奉诏受命创作了大量的著述。如张廷玉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恭跋》、鄂尔泰的《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恭跋》、汪灏的《随銮纪恩》、张玉书的《扈从赐游记》、赵翼的《檐曝札记》，以及在山庄内纂修《热河志》、校理《四库全书》等大型的文化工程，这些文臣们经意或不经意的笔墨酣畅之作，使这样一座政治性的园林充满了人文色彩。

五、小 结

综上所述，由于康乾时期是清文化的成熟期，而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避暑山庄及其皇家寺庙群的修建。这正是其他皇家园林同山庄所不能比拟的。沈阳宫殿的主体建筑具有浓郁的满族风格，但不能体现多民族统一文化的特性。而已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明、清都城北京，其建筑之精、政治意义之深是任何景物都无可匹敌的，但它给人的感觉只是一种单纯的皇权威严与王朝兴替，难以显现清朝政治思想与文化内涵。可是避暑山庄就不同了，它的景物不仅会使人赏心悦目，它的内涵更令人心灵震撼。这一点，曾引起了古今中外许多人士的共鸣。学人余秋雨先生游览山庄时也获得了相同的感受。他说：“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

因此，我们说避暑山庄文化的形成首先是根植于地域性文化之上，以地域性文化为基础，反过来，它又带动和促进了地域性文化的发展。对于承德最终成为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康熙、乾隆两帝功不可没。

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作为康乾两帝的杰作，它不仅是清文化的精华——民族宗教思想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图腾。

注 释:

- ① 《热河志》卷25《行宫一》，第10页《避暑山庄百韵诗》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② 《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八年十月庚戌，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③ 《清文献通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文献。
- ④ 《清圣祖实录》卷151，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⑤ 乾隆御制《〈避暑山庄百韵诗〉序》，见《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⑥ 康熙《御制溥仁寺碑文》，见《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⑦ ⑧ 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记》，见《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⑨ [朝鲜]柳得恭：《热河纪行诗注》，上海书店1994年版。
- ⑩ 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西泠印社2004年版。
- ⑪ 承德殊像寺御笔诗匾，见《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⑫ 张玉书：《扈从赐游记》。
- ⑬ 张廷玉：《扈从塞外蒙恩召入行宫泛舟观荷遍览赐宴于流杯亭恭纪二首》，见《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⑭ 汤右曾：《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宣赐宴得游避暑行宫怀恩纪事诗二十首》，见《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孙继新：避暑山庄研究所)

清帝避暑山庄论戒

张斌翀

所谓“戒”，可以笼统的理解为约束和规范行为。一个追求事业进步与品格高尚的人，不光要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更要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些什么，也就是说要做到心有所戒。纵观中国历代君王，举凡有大作为者，又岂不是时时以史为鉴，自警自省。如蜀汉先主刘备曾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清世宗胤禛说：“人有善恶之分，没有贵贱之别！”“创业难，守业更难。”斯人早已远逝，而他们留下的名言警句依然振聋发聩。

避暑山庄，这个彰显着康乾两代帝王宏才大略的离宫别苑，却以避暑山庄这样一个悠然自得的名字长久呈于世人眼前。鉴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幕幕绥远安边、巩固统一的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界同仁普遍认为避暑山庄在其旷达宏大、朴野无华的园景背后，隐藏着许多当年主人的炽烈心思。要想窥测一二，只有从历史的印迹中细细品味。康熙、乾隆在关于山庄景点的题名、题诗、诗注中，知戒重戒，多处涉及到“戒”，特给予整理分析，与大家共飨。

一、戒穷兵黩武、制造民族对立——芝径云堤定景诗的微心大义

芝径云堤是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之第二景，是最早动工的建筑之一，对山庄湖区各处风景具有联缀功能和统领全局之妙。康熙芝径云堤定景诗是所有康乾七十二景全部定景诗中内容最丰富、含义最深刻、最长的一首。全诗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依山庄的选址、工程和感怀三个层次作了叙事和抒情。长诗虽是为芝径云堤而题，但它的构思和内涵已经超越长堤这个小小的范围和时空，顺理成章扩展到整个山庄，并进一步扩展到康熙对治理国家的思考^①。无疑，康熙的这首诗可以帮助我们充分理解康熙营建避暑山庄的目的、建园的理念等等。兹录全诗如下：

万几少暇出丹阙，乐水乐山好难歇。避暑漠北土脉肥，访问村老寻石碣。
众云“蒙古牧马场，并乏人家无枯骨。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
因而乘骑阅河隈，弯弯曲曲满林樾。测量荒野阅水平，庄田勿动树勿发。
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君不见，磬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
又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煦妪光临承露照，青葱色转频岁丰。

游豫常思伤民力，又恐偏劳土木工。命匠先开芝径堤，随山依水揉辐齐。
司农莫动帑金费，宁拙舍巧洽群黎。边垣利刃岂可恃，荒淫无道有青史。
知警知戒勉在兹，方能示众抚遐迩。虽无峻宇有云楼，登临不解几重愁。
连岩绝涧四时景，怜我晚年宵旰忧。若使扶养留精力，同心治理再精求。
气和重农紫宸志，烽火不烟亿万秋。

康熙在诗中以“边垣利刃岂可恃，荒淫无道有青史”，强烈地表达出自己时刻自戒的内容、汲取历代教训的决心和对边疆部族怀之以德的雄心大略。而在随后所陈述的“知警知戒勉在兹，方能示众抚遐迩”，则含有对儿孙后辈、王公大臣大声疾呼、反复强调、谆谆告诫之意，也是为巩固国家安定统一局面特别制定的战略要求。寥寥数语，却语重心长，动人心智，引人深思。

历史上，中原王朝长期把长城作为安疆定边的重要手段，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北方民族对立的局面直到康熙时才发生根本改变。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针对古北口总兵蔡元上奏：“古北口一带边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的条陈，康熙批奏：“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②明确表明自己不修有形长城，更看重巩固无形长城的态度。事实证明，康熙一生都在努力团结蒙藏各族的上层王公贵族，用“怀柔”和“仁政”代替了规模浩大的修筑长城工程。可以说，康熙把修德安民、团结各民族作为立国之本和安定边境的基础。这种固边思想充分体现出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为后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皇帝之一，康熙的忧患意识和修德安民的统治方略，对后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时到今日，对我们的民族政策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戒花天酒地、穷奢极欲

康熙在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中，还有两处提到了戒。一处出现在水芳岩秀定景诗诗前小叙。全文如下：“水清则芳，山静则秀。此地泉甘水清，故择其所宜。构宇数十间。于焉诵读，几暇静养，可以涤烦，可以悦性，作此自戒始终之意云。”

在山静、泉甘、水清之处建一处用来休养的殿堂，闲暇之时，于此享受清静无忧、涤烦悦性的美好时光，对身居大位、时刻殚心竭虑的皇帝来说是件必要的、蛮惬意的事情，由此发发诗性也可以理解，但为何要上升到自戒始终的高度呢？且看全诗：

水性杂苦甜，水芳即体厚。名泉亦多览，未若此为首。
颐卦明口实，得正自养寿。择地立偃房，根基度长久。
节宣在兹求，勤俭勿落后。朝窗千岩里，峭壁似天剖。
远托思云汉，怡神至星斗。精研书家奥，临池愈涩手。
清淡作饮馔，偏心恶旨酒。读老《无逸》篇，年年祝大有。

细品此诗，方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康熙所言自戒始终之事，指的是要戒奢，具体为：得正、节宣、勤俭。

所谓得正，是指要有正确的饮食习惯，这样才会延年益寿；所谓节宣，就是要节制好恶，不轻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因好恶或追求欲望而放纵自己；勤俭的意思就不必解释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皇帝，康熙能把这三方面当作自戒始终的座右铭，难能可贵。

康熙在避暑山庄定景诗中另一处提到戒奢，出现在康熙曲水荷香定景诗中：

荷气参差远益清，兰亭曲水亦虚名。

八珍旨酒前贤戒，空设流觞金玉羹。

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八珍，指八种珍贵食物。前贤应典指夏禹。旨酒即美酒，在康熙题水芳岩秀诗中也出现过：“清淡作饮饌，偏心恶旨酒。”两处关于旨酒的诗句都是康熙联想到了大禹的告诫有感而发，既是自醒自警，也是在告诫他人。

总之，康熙在这两处提到的“戒”是表达反对沉溺于醉生梦死、穷奢极欲、奢靡浪费，倡导勤俭节约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执政方略，体现出一代名君的良好品德。

三、戒之在得

至圣先师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③。字字珠玑。清代康乾诸帝自幼饱学诗书，对此名言自然十分熟悉。但有趣的是，康熙与乾隆祖孙二人都是在晚年方才对此有更为深刻的感受，都曾在避暑山庄围绕“戒之在得”大作“文章”。

据《秘殿珠林》卷一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頊龄、王揆、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采择经语，可刻小玺者。诸臣遵旨恭拟进呈，俱不当意。有顷，朱笔批出‘戒之在得’四字，谕云：‘朕之得天下者厚矣，自古帝王所稀者也。朕今何思何虑？惟守宣尼四字明训’。明年五月在避暑山庄命臣照篆文。梅玉凤刻玺……”康熙还说“朕今年高，戒色戒斗之时已过，惟或贪得，是所当戒。朕为人君，何所用而不得？何所取而不能？尚有贪得之理乎？万一有此等处，亦当以圣人之言为戒。尔等有血气方刚者，亦有血气未定者，当以圣人所戒之语各存诸心而深以为戒也”^④。康熙帝告诫身边的皇亲贵胄、王公重臣应该心存敬畏，各从其戒，而不能放纵自己。特别是自己作为一国之君，虽已年迈，仍要以身作则，尊行圣人提出的戒得之言，引领上下共同营造一个节俭爱物的好风气，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康熙治“戒之在得”小印的目的在于自戒，同时也警戒子孙后代。

康熙在近70岁时治了一方“戒之在得”印，乾隆则在自己70岁的时候，刻意于避暑山庄内建了一座戒得堂，并作《戒得堂记》以示对祖父的纪念与自警。他先是声称帝王所戒与庶人所戒不同，强调帝王有许多地方，诸如欲得贤才、欲得亿万年永承天眷、欲得寰宇安宁万姓乐业等等是不能戒的，皇